

從社會工作觀點探討少年觀護工作

徐錦鋒

壹、前言

少年觀護制度(Probation)係為社區犯罪矯治的一環，它係由少年法院的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針對法官裁判予以觀護處分的少年或兒童，採取監督、輔導與保護並用的方式，期使少年或兒童能適應社會生活的一種專業制度謂之。因此少年觀護制度係指一種判決、一種組織，或是一種過程。具體地說，「少年觀護制度」一詞，在我國應融合觀護處分、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調查保護處（俗稱觀護人室），以及監督、輔導與保護事宜等概念在一起（徐錦鋒，2008：1-3）。

我國觀護制度的起源，雖可以溯至1962年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最初公布。但當時雖將觀護制度納入該法的範疇中，但卻遲至1971年該法再次修正公布施行以後，觀護人（院方觀護人）的法定角色以及服務對象才正式有了規定。1997年10月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參酌日本的「保護觀察制度」與「家事調查制度」的精神，大幅修改原有觀護制度的架構，少年觀護

制度又再分流為「少年調查制度」與「少年保護制度」等兩大部分，但迄今國人仍習慣以「少年觀護制度」名稱稱呼之。

200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公布時，增訂轉介處分及安置輔導執行完畢後，當地主管機關應予以追蹤輔導，並提供必要之福利服務。於是，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除在業務上必須時與社工人員保持聯繫，同時也說明他們同時也需具備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術，才能做好觀護工作。

從英美觀護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可以發現該兩國所存在之社會工作的理論或技術，都對觀護制度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因而少年觀護制度，甚至更生保護制度，均與社會工作具有血緣關係。而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所提供受觀護少年之就醫、就養、就業、住宿等相關協助措施，基本上都是以福利服務項目為範疇。故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實質上也扮演肩負一般的社會福利機能的角色。所以說，如何促使更生保護工作（含少年觀護工作）與社會福利服務相互結合，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更生保護工作的發展主流（林世

英，2001：133）。

本文因限於篇幅，以下僅以社會工作的觀點來介紹少年觀護制度，期盼海內外賢達之士，有以教之。

貳、少年觀護工作的服務對象

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範的對象主要為少年，稱少年者，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少§2）。但該法也將兒童、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包括在內。依該法規定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爲者，由少年法院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少§85-1）。另該法又規定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因忽視教養，致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爲，或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2款觸犯刑罰法律之虞之行爲，而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少

年法院得裁定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少§84 I）。

少年法院所處理的少年事件，以行爲時的年齡而論，觸法兒童為七歲以上十二歲未滿者、觸法少年為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者、虞犯少年為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者（少§2、少§85-1 I）。上述觸法行爲依法應受軍事審判者，得由少年法院依本法處理之（少§4）。但無論觸法兒童、觸法少年以及虞犯少年，其都必須在該事件繫屬後未滿二十歲時，移送少年法院處理之。

受觀護少年的年齡限制，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定而定，依法保護處分至多執行至二十一歲為止，安置輔導至多執行至二十歲為止，另緩刑期中付保護管束或假釋期中付保護管束則可逾二十一歲（詳如圖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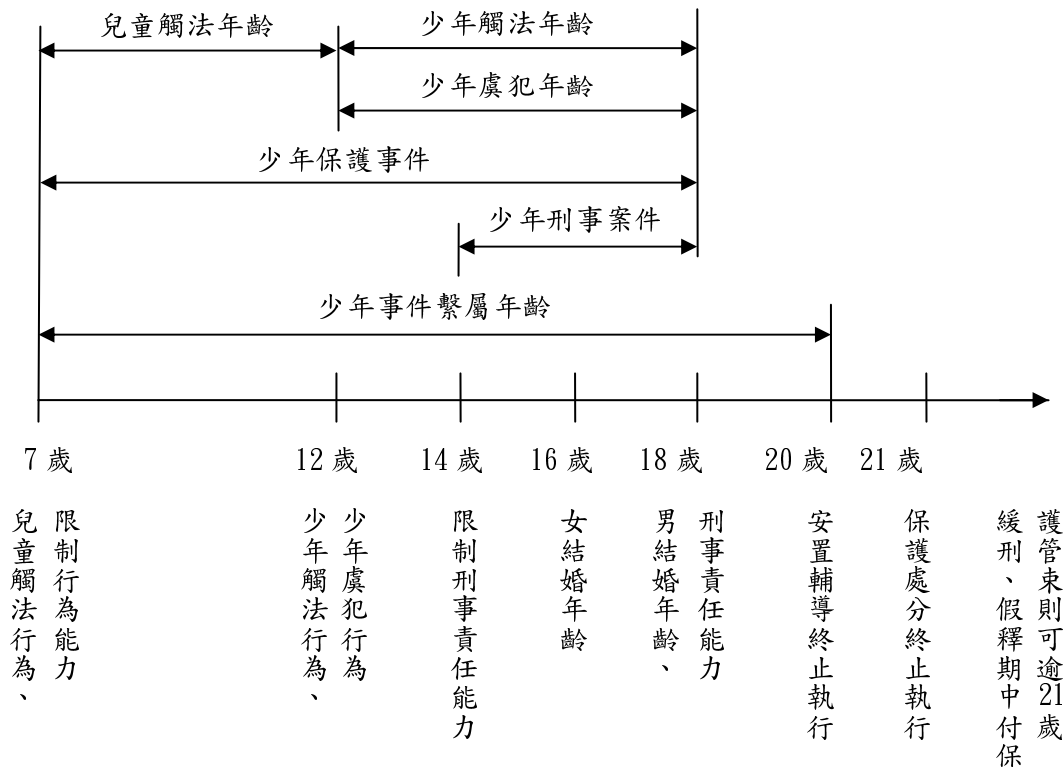


圖 1 年齡與少年事件的關係

參、少年觀護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業務內容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少年調查官職務如左：一、調查、蒐集關於少年保護事件之資料。二、對於少年觀護所少年之調查事項。三、法律所定之其他事務。」同條第 2 項規定：「少年保護官職務如左：一、掌理由少年保護官執行之保護處分。二、法律所定之其他事務。」茲將少年觀護業務分少年調查官與少年保護官等兩方面，敘述如次：

(一) 少年調查官方面：少年調查官的主要職掌為審前調查。審前調查著重個案資料之蒐集與診斷，以供法官審理的參考。故少年調查官除非基於緊急或即時的考量，他（她）是不作個案的輔導事宜。而少年調查官的其他事務，則包括：急速輔導、出庭陳述、交付觀察、協助轉介處分，以及對於責付、收容或安置於福利或教養機構的兒童得為適當的輔導。

(二) 少年保護官方面：少年保護官的角色，偏重監督與輔導，其最傳統的角色是負責保護管束之執行。另少年保護官尚

須執行假日生活輔導及其他事務。此處所謂其他事務，係指執行勞動服務、聲請免除保護管束或感化教育、聲請撤銷保護管束、聲請定其應執行處分、執行親職教育輔導、執行安置輔導、指導適當之人執行保護管束、聲請重新審理以及其他聲請裁定等。

二、少年事件的處理流程

少年法院就報告、請求、移送或抗告法院發回之少年事件，自受理、調查、審理而至執行的整個過程，稱為「少年事件處理之流程」(徐錦鋒，2001：56)。而此

流程頗符合社會個案工作的流程。根據莫藜藜及黃韻如的看法認為，社會個案工作是經由一系列有計畫的工作步驟而完成，其進行時須依循一定的運作程序，可採五階段來說明：1.申請與接案；2.蒐集資料；3.需求預估(診斷與分析)；4.處遇計劃；5.評估與結案(莫藜藜、黃韻如，2003:37)。同理地，調查保護處與少年法院(庭)的業務關係頗為密切，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所參與少年事件處理的流程，實質上與社會個案工作的流程，完全吻合。詳如圖2所示。茲簡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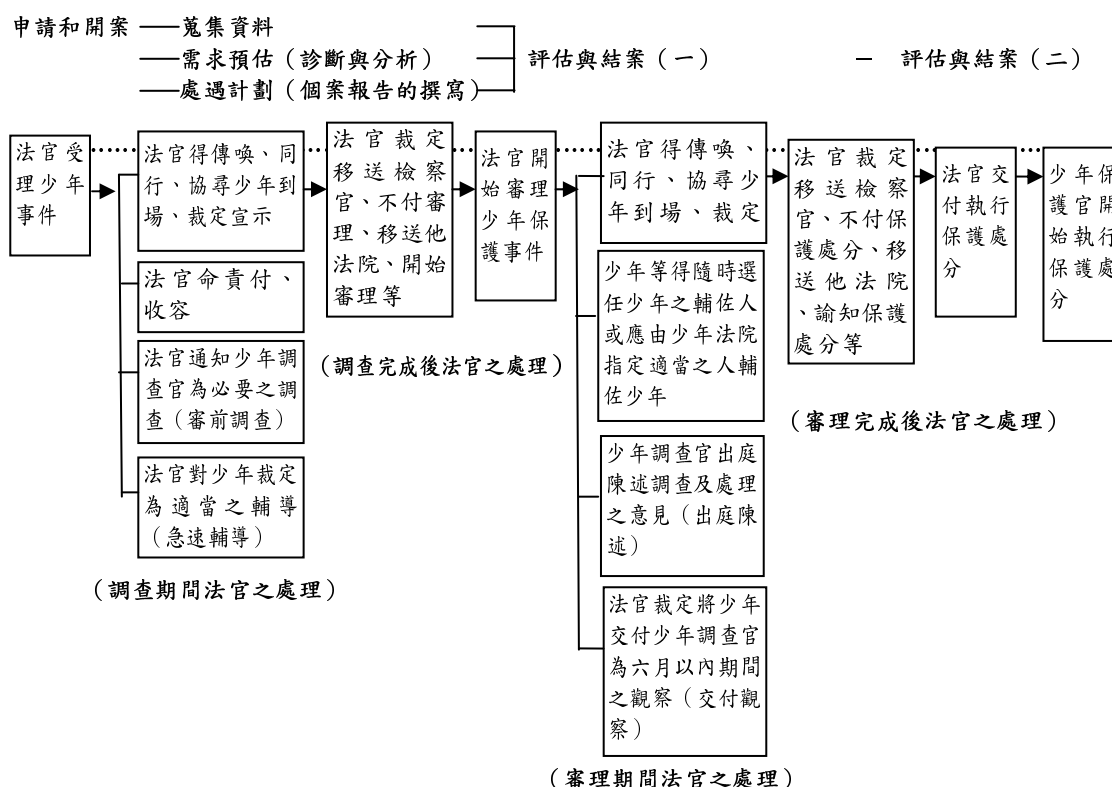


圖2 少年事件的處理流程與社會個案工作流程的關係圖

(一) 受理：本階段係指少年法院接受報告、移送或請求處理少年事件謂之。少年法院所受理的少年事件，其來源分為報告、移送、請求，以及抗告法院的發回等。由於少年事件的先議權歸屬少年法院的法官，故本階段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尚未能接觸到少年事件。

(二) 調查：調查係指少年法院於受理少年事件完畢後，應即針對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爲，其人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項進行調查謂之。上述所謂調查之機關，理論上除負責審理該事件的法官外，尚應包括少年調查官（林清祥，1990：24）。法官在受理少年事件時，對於少年往往已經決定是否責付或收容之。如果法官認為有必要時，對於少年得裁定責付並得在事件終結前，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之輔導，俗稱「急速輔導」。少年事件經調查的結果，得裁定諭知得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轉介處分。轉介處分可分為轉介輔導、諭嚴加管教、告誡等三種；上述處分，依法應交由少年調查官來負責執行。

據上所述，少年調查官所進行的審前調查係著重在社會個案工作流程之開案會談、蒐集資料、需求預估（診斷與分析），以及擬定處遇計劃等為重點。至於處遇計劃的實施、評估與結案，原則上必須等到審理結果裁定保護處分確定以後才開始實施。至於基於危機處理以及避免標籤化的考量，少年調查官對於急速輔導、轉介處分等案件即在本階段就進行處遇計劃的實施、評估與結案等程序，是為例外。

此外，少年刑事案件於少年法院移送檢察官時，檢察官應即開始偵查。檢察官的偵查結果，通常有兩種情形：1.如果認為少年得為不起訴處分時，應將該事件移送少年法院依少年保護事件審理；2.如果認為應起訴者，應向少年法院提起公訴。少年刑事案件亦得交由少年調查官進行調查。

(三) 審理：本階段係指法官著手調查少年應受保護處分之原因、事實的必要證據，以決定處遇的方式謂之。由於少年調查官之調查結果，不得採為認定事實之唯一的證據；且少年調查官所製作調查報告係屬專業諮詢性質，故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少年調查官應於審理期日出庭陳述調查及處理之意見，俗稱為「出庭陳述」。少年法院在審理時，為決定少年宜否為保護處分或應為保護處分，認為有必要時，得裁定將少年交付少年調查官為「交付觀察」；交付觀察結果，可作為往後裁定審理結果的依據。

可見審理階段仍著重在社會個案工作流程中之需求預估（診斷與分析）以及處遇計劃等再確認為主要重點。

(四) 執行：執行從狹義的定義來說，係指交付執行處分或指揮執行徒刑而言。目前保護處分是由少年法院負責交付執行，而徒刑則由檢察官負責指揮執行。此階段的執行具有社會個案工作中之轉案、轉介的性質。因為少年法院法官職司審判訴訟事件，故有關個案之處遇計劃的實施、評估與結案等事宜，自應交付少年保護官掌理為宜。

(五) 觀護：廣義地說，觀護也是執行的一部份，但是前述狹義定義的執行僅是「交付」的動作而已；它並不像觀護工作是實際去負責執行處分。少年保護官於「正式開案」後，會開始「訂期通知」。若通知未到者，除可續行通知或勸導外，尚可聲請同行或協尋、留置觀察、撤銷保護管束等（徐錦鋒，2007：473）。若少年能依照期日來院報到，少年保護官便開始進行輔導。實施輔導初期最主要的任務是在確認輔導計劃是否具有完整性及可行性，其後的輔導則是不斷地修訂輔導計劃以及持續性的輔導，一直到執行完畢為止。

肆、社工人員與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的互動情形

一、社工人員對少年調查官

社工人員可協助少年調查官的主要項目如下：

(一) 參與審前調查的談話：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規定，少年調查官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9 條第 1 項為調查，須與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及其他關係人談話時，得現場訪談或以通知書傳喚到院談話，談話時並得錄音及製作筆錄，筆錄由陳述人簽名或按指印（少審細§16 I）。可見少年調查官進行審前調查時，社工人員可以「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及其他關係人」的身分接受談話。

(二) 執行急速輔導：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年得以裁定為左列之處置：1. 責付於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家長、最近親

屬、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機關、團體或個人，並得在事件終結前，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之輔導（少§26 I 1）。若少年法院於將少年責付於其他適當之機關、團體或個人前，得通知少年調查官先行聯繫（少審細§14 I）。因此法院可將少年責付社工人員接續處理。

(三) 執行交付觀察：少年法院為決定宜否為保護處分或應為何種保護處分，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將少年交付少年調查官為六月以內期間之觀察（少§44 I）。前述觀察，少年法院得徵詢少年調查官之意見，將少年交付適當之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為之，並受少年調查官之指導（少§44 II）。如將少年逕依上述規定交付適當之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為觀察時，少年調查官應與各該受交付者隨時保持聯繫，並為適當之指導（少審細§23 II）。可見少年調查官可委請社工人員執行「交付觀察」案件。

(四) 執行轉介輔導：所謂審前轉向計劃(Diversion)，係指在少年司法制度中，將少年加害人自正式的法院程序轉向非正式程序的途徑（李莉苓，2002：13）。在我國少年法院可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而裁定轉介處分，並交由少年調查官執行之（少§29 II）。其中轉介輔導，實質上由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負責輔導，少年調查官則只做個案管理事宜。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轉介或交付安置輔導之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當地主管機關應予以追蹤輔導，並提供必要之福利服務。」

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追蹤輔導及福利服務，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之。」

(五)參與少年保護事件的處理及少年保護處分的執行：少年法院因執行職務，得請警察機關、自治團體、學校、醫院或其他機關、團體為必要之協助（少§25）。

二、社工人員對少年保護官

社工人員可協助少年保護官的主要項目如下：

(一) 執行假日生活輔導：少年之假日生活輔導為三次至十次，由少年法院交付少年保護官於假日為之，對少年施以個別或群體之品德教育，輔導其學業或其他作業，並得命為勞動服務，使其養成勤勉習慣及守法精神；其次數由少年保護官視其輔導成效而定（少§50 I）。前述假日生活輔導，少年法院得依少年保護官之意見，將少年交付適當之機關、團體或個人為之，受少年保護官之指導（少§50 II）。可見少年保護官可以委請社工人員執行「假日生活輔導」處分。

(二) 執行保護管束：對於少年之保護管束，由少年保護官掌理之；少年保護官應告少年以應遵守之事項，與之常保接觸，注意其行動，隨時加以指示；並就少年之教養、醫治疾病、謀求職業及改善環境，予以相當輔導（少§51 I）。又少年法院得依少年保護官之意見，將少年交付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慈善團體、少年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保護管束，受少年保護官之指導（少§51 III）。基此，少年保護官亦得委請社工人員執行「保護管束」

處分。

(三) 執行安置輔導及施以感化教育：對於少年之交付安置輔導及施以感化教育時，由少年法院依其行為性質、身心狀況、學業程度及其他必要事項，分類交付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或感化教育機構執行之，受少年法院之指導（少§52 I）。安置輔導是一種半收容的處遇，而感化教育導是一種收容的處遇，兩者均可交付福利、教養機構負責執行，而少年保護官則負責個案管理事宜。

三、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對社工人員方面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可協助社工人員或主管機關的主要項目如下：

(一)保護個案之通報

司法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1.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2.充當該法第 28 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3.遭受該法第 30 條各款之行為。4.有該法第 36 條第 1 項各款之情形。5.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兒少福§34 I）。上述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兒少福§34 V）。而違反未依法報告而無正當理由者，依法處罰之（詳參兒少福§61）。可見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對於受保護個案仍負有通報責任。

(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事件之通報

司法人員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該條例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亦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檢警之專責任務編組報告（性交易§6、性交易§9 I）。上述報告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性交易§9 II）。而違反未依法報告者，依法罰鍰之（詳參性交易§36）。可見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對於兒童及少年有性交易行為的個案，亦負有通報責任。

（三）轉介或交付安置輔導後之追蹤輔導

對於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轉介或交付安置輔導之兒童及少年及其家庭，當地主管機關應予以追蹤輔導，並提供必要之福利服務（兒少福§45 I）。前述追蹤輔導及福利服務，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之（兒少福§45 II）。

（四）舉發犯罪

不論何人知有該法第3條第1款之事件者，得向該管少年法院報告（少§17）。另對於少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學校或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機構，發現少年有該法第3條第2款之事件者，亦得請求少年法院處理之（少§18 II）。至於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如負責執行保護處分，應隨時與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保持聯繫，俾能共同輔導少年。

伍、少年觀護工作常用的社會工作技術

多年來少年觀護工作仍舊偏重在個案

的處理技術，對於團體工作的運用仍不及個案工作實施普遍的。至於社區工作幾乎未能運用在觀護實務。觀護實務忽略社區工作，吾人認為其主要原因有三：1.國內犯罪預防工作屬於法務部所掌理，因而無論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其主要工作僅著重在法院內部事務。2.司法當局對於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的養成教育與在職訓練均著重在處理個案的層次。3.司法首長擔心司法人員過度運用社會資源或時常與外界接觸，將會影響司法風氣，進而危及司法審判的公正性。茲將少年觀護工作常用的社會工作技術，說明如後：

一、社會個案工作

社會個案工作中有關接案、會談、社會調查、問題診斷、個案管理，以及社會資源的運用等技術，常被運用在少年觀護領域裏。其中，社會個案工作中有關學習理論或行為修正模式，如代幣制(Token economy)、嫌惡法(Aversive therapy)等，較常被運用在少年觀護的處遇中。代幣制對於控制偏差行為與建立良好行為是有效的，尤其用在兒童或少年的效果會比用在成年身上更好（Howard Abadinsky, 1994：296-297；徐錦鋒，2007：459）。

由於受觀護少年係屬非自願性個案，因而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會運用：1.指定期日報到；2.電話抽訪；3.函件聯繫；4.實地訪視等方式，而與受觀護少年常保接觸。另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也會採用：1.直接觀察；2.間接訪查；3.實地訪視等方式，來注意受觀護少年之行動。

二、個案管理

對於具有多重問題的受觀護少年，由於其經常需要在不同機構，分別接受處遇。且因少年保護官握有法律的強制性，故一般認為如果由少年保護官來連結個案需求與社會資源，通常效果會較好。少年觀護工作較常運用個案管理的理念，採用連結、協商、倡導、監督以及協調等個案管理的策略，來整合其他社會資源(王玠、李開敏、陳雪真合譯，1998：2002)。上述策略中，前三者是在維持受觀護少年與助人環境間合宜的連結；至於監督與協調則在確保該少年與助人環境間的進展是否順利，以及是否有衝突或重覆之情事發生。

調查保護處引進個案管理模式的結果，少年保護官不僅能扮演少年與其所需資源間中介者的角色，抑且對於少年需求與社會資源提供者的資源如有無法連結時，經由少年保護官出面協商、倡導、溝通與協調確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然而少年保護官究竟要扮演個案管理者或個案處遇的角色，司法當局常陷入迷思。但根據日本立法例發現，少年需接受治療性處遇者，與日俱增；因而日本少年保護官必須接受研習治療性處遇的專業知識(林世英，1997)。因此，少年保護官的專業層級應該是具有處遇與治療能力的一種專業人員。

三、社會團體工作

少年因需要獲取同儕的支持，以及學習楷模(modeling)，故頗適合運用團體動力來促其行為朝正向的改變。以往由於少

年調查官與少年保護官所承受的少年案件繁重，少年觀護工作較偏重團體教學或輔導活動，以滿足實務的需求，並能解決當時案件的繁重負擔。但是最近十年以來，少年案件明顯地驟減；相反地，受觀護少年的行為問題卻越來越多樣化、惡質化。因而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的專業層次如何因應時代的變遷去提升，也成為當前革新少年觀護工作，非常重要的議題。影響所及，少年觀護實務開始朝向犯罪類型(加害人處遇)、特殊需求類型(被害或創傷經驗處遇)，以及一般需求等三個方向去規劃團體工作(徐錦鋒，2007：493-495)。

目前國外的教育或處遇方案也開始引進觀護工作中，以親職教育為例。戈登博士(Thomas Gordon)所提倡的父母效能訓練(Parents Effectiveness Training，簡稱P.E.T)，此方案屬於教育模式，旨在幫助父母學習增進親子關係，以及作為解決親子問題的知能訓練(林竹芳譯，1988；郭靜晃，2005：100-106)。戈登的理論，尚可修改為青少年衝突管理訓練，以作為青少年與其父母或他人溝通技巧訓練之用(賴春璇，1998)。目前已有法院將父母效能訓練與青少年衝突管理訓練結合，分別對父母與子女實施親子教育專業訓練，成效良好(何惠月，2008：125-138)。

此外，調查保護處處長為集思廣益，共同尋求少年疑難的解決對策，兼能提昇執行者之專業知能，每三個月應召開一次個案研討會，邀請參加的對象宜包括與個案有關之社政、教育、心理輔導、衛生醫療等專家學者及有關少年調查官、少年志

工參加。

陸、檢討與展望

一、溝通特權

所謂「保密原則」是指自專業關係開始，工作者對案主在會談過程所揭露的資料、會談內容或任何與案主有關之訊息，工作員必須嚴守專業保密之職責謂之（潘淑滿，2000：208）。故專業助人者知道案主的秘密是不應該與第三者分享，是為「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工作者的保密行為是獲得案主信任的重要手段之一（曾華源等，2006：161）；也可以說是會談溝通的先決條件。因此，專業倫理遂要求工作者在對案主以外的第三者透露案主的私密性資料，對案主的拍照、錄音、攝影，以及讓案主加入研究計劃的參與等之前，都必須先獲得案主的同意，此涉及「知後同意權」(the right of informed consent)的問題。是故，工作者僅立基於已獲案主適當而有效的知後同意的專業關係上，來提供服務（包承恩等譯，2000：116）。

社工人員除非本國法律有賦予其保密特權，否則其有可能在法院的要求下，被迫提供應被保密的案主資料和紀錄，此即所謂「溝通特權」(privileged communication)的問題。所謂「溝通特權」是指專業人員在法律過程中，未經案主的同意，不可將案主的秘密公開揭露。溝通特權是一個法律概念，因為如果工作者未被特別列在法令中受優先權保護，則案主權益會因法庭要求提出證據而被妥協；而這些證據若有

溝通特權則可免於被揭露（楊瑞珠 1997：165）。顯而易見地，溝通特權賦予工作者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案主的權益，故它是給案主而非專業人員（曾華源、李自強主編，2004：100）。

上述保密原則也是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與受觀護少年建立信賴關係(rapport relationship)的第一步。但實務上發現，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所製作的個案輔導紀錄或輔導案卷在法院內部卻毫無限制地被揭露。因為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執行職務，應服從法官之監督（少§9Ⅲ）。而且司法院進一步規定少年保護官每三個月應將執行或指導執行保護管束之少年輔導案卷，送調查保護處組長、處長檢閱後轉少年法院法官核備（少執辦§10Ⅰ）。組長、處長應詳細檢閱少年輔導紀錄，並提供少年保護官必要之指導（少執辦§10Ⅱ）。

此外，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只要發現個案的觸法或虞犯行為均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辦理，而社工人員則不在此限（參照少§18Ⅰ）。

二、文書保密

社工人員對於其所掌理有關少年文書的保密問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別有規定。該法規定保護、安置、訪視、調查、評估、輔導、處遇兒童及少年或其家庭，應建立個案資料，並定期追蹤評估（兒少福§44Ⅰ）。因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兒少福§44

II)。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遭受該法第30條或第36條第1項各款行為兒童及少年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有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之情事者，亦同（兒少福§46 I）。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少福§46 II）。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兒少福§46 III）。是以社工人員提供予於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有關少年的資料時，由於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礙於法院內部規定，無法做到絕對保密，因此，凡社工人員所提出之記錄涉及案主隱私有關內容時，自應謹慎處理為宜。

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少§83 I）。另根據社會工作師法第15條規定：「社會工作師受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詢問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因此，如果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詢問的是「觀護個案」，而社會工作師詳實予以陳述或報告，則法院觀護案卷資料將面臨「全都露」的情事發生，實有違立法意旨。

三、轉介輔導

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意旨認為少年所犯情節輕微，要保護性較低，毋須經一般審理程序，遂採行轉向措施，以避免少年受到不良的影響。故該法將轉介輔導、交付嚴加管教、告誡等三種處分，合稱為轉介處分。少年因所犯情節輕微，故予以上述轉介處分，其中轉介輔導既已轉介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為何立法者仍不放心而仍然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規定其於其適當輔導結束以後，再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予以追蹤輔導及福利服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四、安置機構

少年安置輔導之福利及教養機構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安置機構受託辦理安置輔導業務時，應與少年法院訂定契約，並通知個案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安置機構應與少年法院指定之少年保護官共同擬訂個案輔導計畫；主管機關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相關規定，輔導、監督、檢查安置機構業務之執行及財務之管理等。顯然地，法院對於安置輔導業務之執行，似乎較偏重法律的制定，而較不熱衷於實務面的改善措施。

因而實務人員特在 2004 年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所舉辦的「兒童及少年司法轉向暨安置輔導實務研討會」中，便對於安置輔導提出頗多建議，諸如：1.法院似乎缺乏「專責人員」，專責處理(the case manager)；2.不同專業領域的合作，觀點上亦有不同；3.建立安置輔導機制與服務模式；4.社政機關與法院間雙方角色定位問

題；5.法規內容有所缺失等。上述建議頗為中肯，也道破少年觀護工作在法院系統內部的困境（中華民國觀護協會，2004）。

五、社會福利服務

受觀護少年也是少年福利所服務的對象少年，但一般社會福利體系卻有意忽略這些對象的存在。所以當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與社政機關或福利機構互動時，經常受到拒絕，因為他們說：我沒有處理非行少年的能力，或性侵害不是我們機構所處理的對象，從事專業本位的觀點，或許可以理解，但也引起司法人員的喟歎：究竟少年福利政策是否包括非行行為少年的福利在內（賴恭利，2003）因此，未來司法院宜主動與內政部研商彼此合作之服務流程以及所需經費負擔等問題。

六、虞犯應回歸社福體系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事之一，宜由相關機構協助、輔導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一、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或從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禁止從事之工作，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禁止而無效果。二、有品行不端、暴力等偏差行為，情形嚴重，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力矯正而無效果（兒少福§33）。上述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所禁止的行為，實與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的「虞犯」之立法意旨相仿，均在保障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因此站在「少年本位」以及「最小傷害」的原則，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所指的虞犯少年，自宜先由少年福利機構先行處理。

七、回歸賦予少年調查官有受案權

在英美少年法制中受案及轉向均屬於少年調查官（即觀護人）的主要職權，因而如觀護人認為有不宜移送司法處分之少年事件，則改移其他非司法的社會福利機構（張迺良，1985）。反觀我國，少年事件的先議權在法官手中，因而我國現行的轉向制度，與國外的法官是居於司法事後審查的角色是有截然不同的概念。我國的轉介輔導實質上已完成少年事件程序中的所謂「調查」階段，因而與國外審前轉向制度設計在「審前」階段，做法上亦有所相違。故未來我國轉向制度實應回歸賦予少年調查官享有受案權，似較符合少年之最佳利益。

柒、結語

從美日的立法例來看，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的角色雖有部分是在協助法官進行審判工作以及執行法官的裁定，但不是全然以法官為中心，來構成其專業體系。少年觀護工作最早由美國人奧古斯都所創設而來，當時奧古斯都是一位志工，而不是專業人員。因此觀護制度的誕生，並沒有顯赫的身世來壯大其聲勢。相反

地，觀護制度隨著社會工作的專業化，也逐漸專業化。如今，少年觀護制度已經形成是一種多種學科所整合出來的專業制度。因而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的培養不易，其養成訓練也非一蹴可及。

少年觀護制度與社會工作具有血緣關係，故早期社會工作理論與技術，帶來觀護專業化很大的啟蒙作用，尤其傳統觀護人的角色在於「控制犯罪」，因而觀護工作的目的乃在促使少年的行為改變，故運用社會個案工作於少年觀護工作的領域中，格外具有特殊的意義。於今觀護處遇措施，諸如：少年之就醫、就養、就業、住

宿等相關扶助措施，在在均有賴於福利服務機構的協助。

職是之故，今後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如何與社工人員更緊密地聯繫與配合，共創更大的合作空間，誠屬當前觀護工作很重要的課題之一。亦期盼法官對於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社工人員，也能以最大的能耐來接受彼等的專業投入，進而共謀少年之最佳福祉，才是未來少年及國家之福。

（本文作者現為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觀護協會(2004)，《兒童及少年審前轉向與安置輔導實務研討會》，臺北市：中華民國觀護協會主辦。
- 王玠、李開敏、陳雪真合譯(1998)，《個案管理》，臺北市：心理。
- 包承恩等譯(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臺北市：洪葉。
- 何惠月(2008)，〈父母效能訓練(PET)團體在觀護工作的實施〉，《2008 年高關懷少年的心理及社會治療實務研討會》，臺北市：中華民國觀護協會主辦。
- 李莉苓(2002)，〈少年法院與社會資源之運用〉，《司法院 90 年度專題研究》。臺北市：司法院。
- 林世英(2001)，〈從日本更生保護設施機能展望更生保護制度〉，《司法保護轉向，機構安置輔導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臺北市：中華民國觀護協會主辦。
- 林世英譯(1997)，〈日本觀護制度〉，《各國觀護制度》（未發表）。
- 林竹芳譯(1988)，〈父母效能訓練〉（中文版），臺北市：（欠詳）。
- 林清祥(1990)，《少年行為保護與處罰》，臺北市：書泉。
- 徐錦鋒(2001)，〈我國少年觀護制度的新紀元〉，《月旦法學雜誌》，74：51。
- 徐錦鋒(2007)，〈少年觀護制度〉，楊士隆、林健陽主編，《犯罪矯治－問題與對策》。臺北市：五南。
- 徐錦鋒主編(2008)，《少年觀護制度理論與實務》，臺北市：洪葉。

- 張迺良(1985)，〈少年法制之再檢討〉，《「犯罪防制之整體策略」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臺北市：中華民國觀護協會主辦。
- 莫藜藜、黃韻如(2003)，〈社會個案工作的過程〉，許臨高主編，《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實務》，臺北市：五南。
- 郭靜晃(2005)，《親職教育理論與實務》，臺北市：揚智。
- 曾華源、李自強主編(2004)，《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理論與技巧》（第六版），臺北市：洪葉。
- 曾華源等(2006)，《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臺北市：洪葉。
- 楊瑞珠(1997)，《諮商倫理》，臺北市：心理。
- 潘淑滿(2000)，《社會個案工作》，臺北市：心理。
- 賴春璇譯(1998)，〈解決學校內衝突〉（中文版），臺北市：富生產力推廣中心。
- 賴恭利(2003)，〈談少年事件司法體系與社政（福）體系之合作支援－以少年司法工作者角度談社政（福）資源之參與〉，《兒童福利期刊》，4，頁 25-32。
- Abadinsky, H. (1994). *Probation & Parole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